穿越监控资本主义：从计算机伦理学的哲学视角进行批判性分析

Angelica Sofia Valeriani信息技术伦理学，米兰理工大学，意大利米兰

arXiv:2305.03787v1 [cs.CY] 5 May 2023

监控资本主义是一个描述此类实践的概念：收集并分析海量用户数据，以用于定向广告及其他形式的变现。近年来，这一现象日益普遍，谷歌和脸书等科技公司利用用户的个人信息提供个性化内容和广告。监控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例子是利用军事技术为国家安全目的收集和分析数据。在此背景下，监控资本主义涉及运用面部识别和社交媒体监控等技术，搜集被视为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个人和群体的信息。这些信息随后被用于指导军事行动和决策。本文旨在从两种不同的伦理框架视角，对监控资本主义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功利主义是一种后果主义伦理学说，它依据行为能否为最多数人带来最大程度的幸福或快乐来评判行为；康德主义义务论则是一种非后果主义伦理学说，强调个人自主性、自由和尊严的重要性。一方面，功利主义框架揭示了信息技术（*IT*）及其提供的功能乍看之下如何为大多数人带来积极体验，包括幸福、娱乐和快乐。另一方面，康德主义义务论框架主要关注个人的自由和自由意志。这一议题尤其涉及以获取服务为交换条件而授予数据访问权限，以及监控资本主义所实施的操纵可能产生的影响程度。

1 引言

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大公司的业务并增强国家的实力，社交网络和政党正在实施一种深入而私密的操纵，这种操纵根植于监控资本主义的理念之中。本文将尝试展现这一新现象，这种现象可通过定向广告和军事技术实现，本文将从两种不同的伦理框架——功利主义视角和康德视角——加以探讨。本文旨在阐明这两种框架下的正当性依据及其影响。具体而言，我将首先定义监控资本主义的概念，并说明当今人们如何看待它。随后，我将深入分析一些最常见的现实情境，展示这一现象如何付诸实践，例如定向广告，以及极权政体和民主国家中的强制性操纵。接着，我将结合所提出的伦理框架分析这些方面：一方奉行“目的证明手段正当”，另一方则以义务框架为核心，并引入其他哲学著作为分析提供支持。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2节将介绍监控资本主义，界定其特征与重要属性。第3节和第4节将分析监控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定向广告，以及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操纵人们来实现。选择这些现实场景进行分析，尤其是因为它们很能代表当今社会的主要需求。一方面，定向广告推动消费主义，使人们能够轻易实现各种愿望（例如，轻松发现新的地点、机会和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与国家安全与政治和军事战争都有关联；如今，人们对这一议题十分敏感，因为犯罪现在极易实施。第5.1节将在阐述该伦理框架的要点后，从功利主义视角回顾这些现象，尤其是与快乐和娱乐关系更密切的定向广告现象。第5.2节将沿用第5.1节的方法，转而应用康德提出的义务伦理框架，并着重讨论与政治领域相关的现象，因为这些现象更能体现对人民和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观念。第5.3节将完成

分析，深入探讨这两种现象在两种伦理框架下的表现。该节还将阐明这两种框架及其价值观之间的主要差异，最后在第6节得出结论。

2 监控资本主义的新帝国

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催生了当今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互联网和专有平台（如应用程序）上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就是对民众进行监控。这一现象使数字化公司（它们垄断了社会）能够使收益呈指数级增长。监控的数字化彻底改变了广告的性质。如今，这一体系意味着有效隐私的缺失。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2013 年棱镜计划，便是军事力量与大型计算机和互联网公司紧密交织这一模式的一个例证。微软、谷歌、雅虎、脸书等公司在部分合作、部分受法律胁迫的情况下共享数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公司每六个月都会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其他情报机构移交数万个个人账户的数据，而移交给秘密政府的账户数量还在迅速增加 [1]。根据相关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实际上通过无界线人计划、棱镜计划及其他秘密项目，获取了数亿美国人的手机数据，以及海外人口的相关数据。最终目标是利用新型军事技术实现资本化，打造更大的全球互联网垄断，并拓展军事数字交换系统。在资本化的背景下，一个充分体现数字监控时代垄断金融资本集中结构的趋势实例，是“证券化”实践日益同时代表着一个由 [1,3]中所指出的要素主导的世界。具体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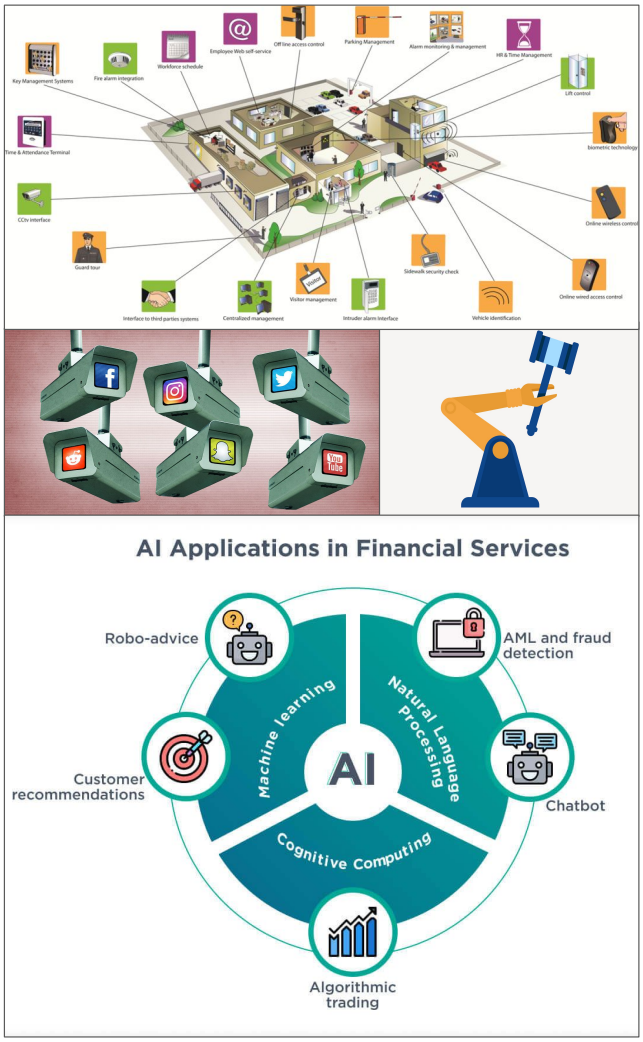


图 1. 主要监控领域分类：安全控制系统、公共与私人监控、法院和金融服务中的人工智能应用。

1. 金融衍生品交易 2. 公共与私人监控网络 3. 安全控制系统军事化 4. 将司法程序排除在有效的文官控制之外

监控可以简单地视为一系列技术手段的集合，这些手段共同可能使主体受到规制（第一种解释）；也可以视为一种有目的、系统化且以社会控制为导向的关注（第二种解释）。极权主义政权或许会采纳第二种定义，将监控视为强化其对民众控制的工具；而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或许更看重监控的合理性、对福祉的潜在作用及其合理性。总的来说，无论如何都必须注意，监控还必须结合其经济影响加以审视，而这并非仅仅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 [2]。正如本文探讨的核心现象——定向广告和强制性操纵——所表明的那样，监控资本主义所涉及的最重大问题之一，是权力分配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源于对人们数据的获取，而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一过程（相关情况因一些举报人的披露而为人所知并得到讨论）。这种权力的分量集中在能够获取并管理所收集信息的行动者手中 [3]。

3 定向广告

如今，广告的投放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型技术工具，尤其是社交网络，促使个人数据被披露：有时是用户有意为之，但更多时候并非出于本意，这带来了全新的广告投放方式。定向广告已成为一种广泛采用的营销策略，利用数据驱动的方法，根据特定兴趣、行为和特征识别潜在客户。其目的是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向合适的受众传递个性化广告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形下，公司和机构只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

尽可能扩大其业务规模。其首要且唯一的目标是优化营销策略，并增加用户的消费。通常，当个人在社交网络上创建自己的个人资料时，所提供的信息就会被收集、存储，随后由推广者利用，以便更轻松地触达目标受众中更具针对性的群体。消费者行为和习惯对公司的业务而言极具价值，因此，尽管已经制定了一些旨在确保避免数据被滥用的规则 [4]，公司仍积极投入巨额资金购买能够生成数据库、用于存储此类个人数据的应用程序。

根据多项研究和常识可以发现，不同用户对定向广告的感受可能各不相同。定向广告通过向客户提供更相关、更实用的信息，可以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例如，如果有人正在寻找某种特定的产品或服务，他们更可能会欣赏与其搜索查询相关的广告。此外，定向广告还可能让客户发现原本未曾留意的新产品和服务，从而为客户和企业双方带来积极结果。因此，定向广告主要使公司能够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将重点放在最有可能感兴趣的客户身上，而不是把资源浪费在兴趣较低的人身上。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人们的兴趣、偏好和行为数据，公司可以影响客户决策和行为，甚至可能导致剥削或操纵。当针对弱势个人或群体（例如儿童、成瘾者或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时，这尤其令人担忧。的确，有些人会因为发现与自身兴趣更相关的广告而感到有趣、快乐和吸引力，但另一些人则可能将这种侵扰视为一种令人恼火的现象，也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5, 7]。

如今，研究工作对匿名化用于商业用途的完整数据抱有很高期待，并且对此投入了大量关注，但至少在当下，这往往并不可行 [6]。按照当前的定向广告模式，需要依据用户数据采用不同的标准。这不仅涉及用户对产品给出的明确评分，也包括网站的访问次数、广告是否被打开、是否点击链接、不同感兴趣的项目之间的关联、用户通常在一天中的哪些具体时段访问等。广告活动中重要因素的清单非常长，其核心与优势都体现在社交媒体上 [7]。定向广告引发的主要担忧之一是隐私。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例如浏览历史、搜索查询和位置，可能侵犯隐私，并造成潜在危害。例如，数据泄露可能导致身份盗窃、金融欺诈及其他网络犯罪。此外，定向广告还可能造成回音室，使人们只能看到强化其既有信念与偏见的信息，从而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

4 军事技术与政治

第3节所描述的定向机制不仅产生经济监控效应，也对心理监控现象造成重大影响，因为技术手段被用于实施操纵，并获取个人信息和敏感信息。本节聚焦于政治和社会秩序场景。从自由和心理强制的角度来看，一个主要的批判性问题在于，人们不得不允许他人完全访问自己的数据，才能获得必要的服务。表面上，他们可以选择拒绝授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大多数服务都要求用户同意完全访问数据；这意味着，拒绝授权就会使用户无法使用某项特定的必要服务，以及所有可替代该服务的同类服务 [14, 19]。自由的缺失不仅体现在这种机制中，也体现在与政治和社会背景相关的其他情形中。

一个实际例子是基于外观的人员检测视频监控模块。在这种情况下，数据会经过处理和分析，以提取皮肤检测等特征。在极权主义政权等情境中，使用这些工具可能会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因为它们会增强政府的压迫力量，并使其能够对大众和政权反对者实施更严酷的控制 [8]。监视技术改变了军事组织的运作方式，为情报收集、侦察和态势感知提供了新的能力。无人机、卫星和其他遥感技术使军事组织能够监控大片区域并收集情报，而无需让军队身处险境。这在地形险恶或难以用传统方法收集情报的地区尤其有价值。然而，在军事领域使用监视技术也引发了对隐私和伦理影响的担忧。例如，使用无人机一直备受争议，因为这可能造成平民伤亡，而且远程操控人员无需承担责任。此外，在冲突地区使用监视技术可能侵犯个人的隐私权，并导致侵犯人权。

作为另一个例子，现考虑民主国家，在政府领域不当使用监控资本主义工具的情况，可以在选举和投票领域找到。监视技术也日益成为政治领域中常见的工具，被用于出于各种目的监控个人和群体。政府可以利用监视技术监控并追踪国内外持不同政见的声音，这可能导致人权和公民自由受到侵犯。这会对言论自由以及个人在不担心遭到报复的情况下表达意见的能力产生寒蝉效应。此外，在政治竞选中使用监视技术也引发了人们对操纵公众舆论的担忧。

例如，从社交媒体收集的数据可用于创建个人的详细个人资料，并向其发送个性化信息，从而可能导致操纵和剥削。这会破坏民主进程，因为它造成了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并使某些候选人或政党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事实上，政治领域中的受众可能受到影响并被迫作出决定，而这些决定可能与人们的真实想法相矛盾。显然，说服和操纵一直是政治界和营销界的一部分，但在这种新型监控资本主义中，这一现象的影响力得到了放大。作为一种心理机制，所有选择都可能受到外部环境的操纵；决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程序，监控资本主义在其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在这一情境下，个性化和定向信息，以及对手专门制造的假新闻，都可能削弱选民自主权并改变历史进程 [9, 10]。

总体而言，必须指出，许多国家大力投入这种对私人生活的侵扰，首要原因是应对针对整个军事系统和金融系统的网络战威胁。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与恐怖袭击有关，各国强烈希望预防并遏制此类袭击。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加强安全监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侵入人们的思想虽然在道德上并不正确，却能有效地更早发现潜在威胁 [10]。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整个金融系统，因为针对这一领域的攻击可能严重动摇大多数人，例如导致他们失去全部资产，并引发深远且广泛的危机。监控技术对军事和政治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情报收集和决策带来了新的能力。然而，它也引发了对隐私、伦理以及潜在滥用的担忧。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应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法规，确保监控技术的使用透明、可问责，并尊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此外，在监控日益普遍的世界中，个人也需要了解潜在风险，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隐私与安全。

5 聚焦于伦理框架

本节将通过核心原则，分析所提出的伦理框架，这些框架对于伦理学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将比较它们的假设、公理和影响。表1展示了所考察哲学理论的关键要点对比 [18]。

前几节所描述的两种现象，即第3节中的定向广告和第4节中的军事技术，均通过伦理视角进行分析。

伦理框架之间的比较

功利主义	**义务论**
杰里米·边沁	伊曼努尔·康德
其他	Self
功利主义原则	绝对命令
结果主义	动机主义
效用数学计算	逻辑推理
仅根据行为的后果进行判断	被一致判定的行为为对或错，源于其内在本质与属性
伦理行为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道德行为由其背后的善意所界定
	道德行为由其背后的善意所界定

表1。功利主义与义务论框架的比较。这些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分别是杰里米·边沁和伊曼努尔·康德。功利主义关注多数人的福祉，即“他者”，仅依据后果导向方法评判行为。与之相反，康德关注“自我”。行为依据公理、行为的内在属性以及逻辑推理进行评判，其前提是个人具有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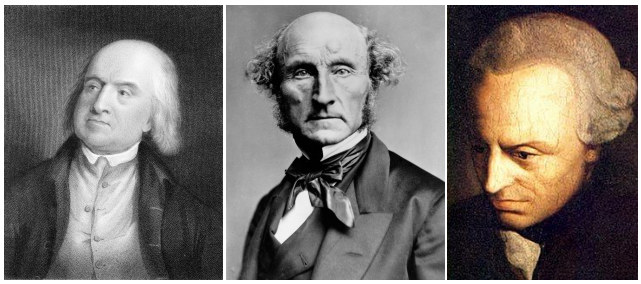


图2。从左至右：功利主义的创始人杰里米·边沁，其价值理论的核心思想建立在享乐主义之上，即只有快乐本身才是善的本质，其他一切事物都只是实现快乐的工具。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功利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原则，意味着只要不影响他人的快乐与福祉，获得快乐就是纯粹且正当的。伊曼努尔·康德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将自己的哲学建立在批判之上，并从绝对命令中推导出道德法则。

5.1 功利主义框架

本节将依据功利主义原则进行分析。杰里米·边沁以其功利主义理论闻名于世，该理论认为，行为的伦理价值取决于它能否为尽可能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边沁认为，快乐与痛苦是驱动人类行为的终极因素，而理性决策应始终以最大化快

乐、最小化痛苦为目标。在现代社会，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已应用于社会的诸多领域，包括商业实践。监控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例子，它指的是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针对个人消费者量身定制广告及其他营销策略。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功利主义的第二位主要倡导者，他的思想也尤为相关，因为他同样强调个人自由与自主性的重要性，并主张国家只有在防止他人受到伤害时，才应干预个人自由。

从功利主义视角来看，监控资本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通过向消费者提供符合其个人需求和愿望的产品和服务来最大化幸福的方式。然而，人们也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具有剥削性和侵扰性，尤其是在用户不了解其数据被收集和使用的程度时。边沁本人支持将监控作为促进社会福利的手段。他认为，持续监控和评估人类行为有助于发现并解决犯罪和贫困等社会问题。然而，边沁也认识到监控体系可能遭到滥用。他主张对这类体系实施严格的监督并确保其透明度，以防其被用于不正当目的。在监控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可以借鉴边沁对透明度和监督的重视，确保用户充分了解其数据如何被收集和使用，并追究公司滥用数据的责任。按照密尔的观点，在监控资本主义中，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会引发对个人隐私和自主性的重大担忧。密尔很可能会认为，个人有权控制自己的个人数据，公司和其他组织不应在未取得明确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和使用这些数据。此外，密尔担心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伤害，无论这种权力掌握在国家还是公司手中。在监控资本主义的情形下，公司可能拥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进而剥削个人并侵蚀民主，这种风险不容忽视。

根据古典功利主义框架，宣传、定向广告、娱乐，以及一般而言监控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的所有新型技术产品，都可以被视为给大多数使用者带来快乐的来源。这类商业模式能够更好地契合用户的品味与偏好。因此，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说它有助于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此外，从商业公司的角度来看，其唯一目标是成功经营，这一现象并不会造成任何损害，也不会伤害大量人群，因为数据仅仅用于对消费者进行分类，从而实现更高效的经营 [11]。此外，另一个必须强调的重要因素是，定向促销和优惠通常与用户偏好相符，因此往往不会被认为令人厌烦。

核心挑战在于如何量化所提供的快乐，以及如何权衡最终能够从中获得快乐的人群比例，同时考虑到“让最多数人获得最大的快乐”这一视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从用户（和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种伤害可以被视为对隐私的侵犯，而最重要的是对用户自由意志和个人意图的侵犯。第一种不公平之处在于，普通用户最初并未意识到这一过程，也不知道点击某个特定广告后，自己便会被归入一个具有共同兴趣的定向群体。一旦用户意识到自己明确表达的偏好已被获取，第二种不公平现象便随之产生。事实上，用户以及绝大多数人都遭到了剥削和滥用，因为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分享的内容并不仅限于自己认为有意主动分享的信息。未经他们同意而被窃取的，还有大量他们并不愿意分享的其他信息，而这正是一种隐蔽且狡猾的滥用形式 [13, 19]。因此，社交媒体导致公共领域过度自由化，使其得以进入私人空间，反之亦然。在线分享个人经历、情感以及人生中的重要事件，都是人们自主做出的决定。然而，用户在线分享的个人情感或事件，几乎总是意味着其经历会与某种价值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这些经历会转化为公司可量化的货币资源 [12]。

在军事技术的背景下，监控和监测可以用于收集情报并防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然而，人们也担忧利用此类技术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从功利主义视角来看，如果监控和监测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的幸福与福祉，那么这种做法可以得到正当化。然而，边沁认识到此类系统中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因此主张实施严格的监督和透明度要求，以防止其被滥用。边沁对透明度和监督的重视可以用于确保个人充分了解其数据是如何被收集和使用的，并确保公司对任何数据滥用行为承担责任。此外，功利主义伦理学要求考量此类系统对个人和社会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例如隐私和自主性的削弱。在军事技术和政治的背景下，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观要求考量监控和监测对于国家安全可能带来的益处与危害。尽管监控和监测可能是防范威胁、保护公民所必需的，但功利主义伦理学要求仔细考量其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 [13, 19]。

总之，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为理解监控资本主义和定向广告的伦理影响提供了一个框架。虽然这种做法有可能通过根据个人偏好定制产品和服务来最大化幸福，但也引发了对隐私和剥削的担忧。边沁的

强调透明度和监督有助于解决这些担忧，并确保以最大限度提升最多人的幸福的方式使用监控资本主义。

5.2 义务论框架

本节依据义务伦理学原则进行分析。在监控资本主义和定向广告的背景下，康德伦理学说对个人隐私和自主性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根据经典康德框架，考虑到第二条绝对命令——互惠原则，我们可以说，监控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自主性缺失完全缺乏正当性，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核心在于，应尊重人们自主做出选择的道德自主性，而操纵完全违背这一原则。此外，试图操纵人们的观念和决策过程，是对其推理道德自主性的不尊重，将他们纯粹当作手段 [16]。这种做法使社会陷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境地，而大多数人都成了这种不公与商品化的受害者。从康德视角来看，未经明确知情同意而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侵犯了个人的固有尊严，因为这将他们仅仅视为达成目的的手段。对康德而言，道德行为必须以尊重个人自主性和尊严为基础，而将个人数据用于定向广告则损害了这种尊重。这是因为此举将个人视为可被操纵、以获取商业利益的纯粹对象，而不是能够自主、理性地做出选择的人。

首先，在最初阶段，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一内在机制。如今，这一现象已得到更广泛的认知，但大多数人对其真实影响的认识仍不够全面 [17]。此外，除了操纵意图之外，人们缺乏相关信息这一问题也与互惠原则以及人们的道德自主权相悖。另一方面，从相反的分析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监控资本主义诞生并朝这一方向发展的合理性及其最初原因，即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14]。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普遍法则解读为：“允许人们秘密参与犯罪组织，实施具有经济、恐怖主义或军事性质的攻击，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这成为一项普遍法则，那么人们将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感到恐惧，进而导致无政府状态。任何政府都不会支持这样的政策，因为它永远不可能获得选民的投票支持。这种准则无法普遍化，因此显而易见，为了维持和促进社会秩序与福祉，某种形式的控制始终是必要的、值得期待的，也是人们所接受的。在这一微妙议题上，问题的界限十分模糊，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承认控制是被允许的，那么究竟谁应该受到控制，以及一个人依据何种标准会被选中接受控制，仍然只是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社会的做法。

在这一情境中，康德主义框架会陷入矛盾：一方面，从普遍角度来看，任何伤害他人的攻击都必须加以防止，因此它会认为有必要实施控制；另一方面，它又无法接受人们缺乏自主性、受到操纵，以及道德推理遭到漠视。在实践中，这种推理方式的问题在于，严格僵化地遵循道德规则可能会导致盲目，并产生破坏性影响 [15]。关键在于必须告知人们，这与人权的重要性密切相关。控制行为本身或许并非不道德，但如果作为控制对象的人对此毫不知情，问题便由此产生。

此外，康德关注普遍化原则，即伦理原则应适用于所有个人及各种情境。对于监控资本主义和定向广告而言，这意味着公司不应以自己不愿遭受的方式收集或使用个人数据。康德认为，伦理行为必须遵循道德义务，例如尊重每个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在回应这些关切时，康德很可能会主张制定法律法规，以保护个人隐私和自主性，同时仍允许数据驱动型广告和营销发挥其效益。他还会强调，在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时，获得充分且明确的同意十分重要，并且公司实践应遵循透明度原则。

5.3 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直接比较

考虑第3节所描述的第一个场景，可以强调的第一个直接区别是：功利主义主要关注快乐与幸福，并可能以为大多数人增加快乐为由，正当化监控资本主义的手段；而康德框架绝不会以这一理念为由正当化这种政治。康德主义理论会强调快乐与幸福对于每个个人而言所具有的主观性，以及客观衡量其影响的困难（这本身正是第3节提出的问题）。康德不会仅仅通过“赚钱而不伤害人们”这一理念，为公司出于商业目的对隐私的滥用和侵犯进行辩护。根据纯粹义务感，在使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监控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人们应当能够理解这一点。此外，根据义务伦理学，在不告知的情况下，仅仅为了个人和自私的利益而把人当作手段，是对人的尊严的不尊重。必须注意的是，根据康德框架，仅仅进行定向广告这一行为并不违反互惠原则，因为个人并未因此丧失通过理性思考判断何为道德正确的可能性。纯粹的康德框架会认同这样一种社会：用户的隐式数据在其知情的情况下被获取和使用

当且仅当最终目标是开展商业活动时。在这种情况下，行业可以实现其经济目标，同时不损害人的理性思考的道德权利及其自主性；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让人们知情，并且仅为销售更多产品和增加销量这一目的而使用这些数据。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能够确定数据会保持匿名——正如如今大多数研究工作所采用的做法那样——康德也会表示同意。相反，功利主义框架会更加关注社会福利，即必须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幸福；它也会同意这样的假设：这种幸福源于每个个人都能够通过发现符合自身愿望的新地点、物品或可能性，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品味与偏好。一旦人们意识到公司存储数据，甚至存储从用户活动中获取的隐式数据，那么滥用这一概念便不再适用于该场景，因此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不会伤害任何人；尤其是在定向广告变得越来越灵活的情况下，用户可以明确拒绝将此类个人数据用于实现定向广告。事实上，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会根据定向广告促进整体幸福或效用的能力，评估其在监控资本主义中的使用。如果定向广告通过向人们提供更多相关且有用的信息，使幸福或效用总体上有所增加，那么从功利主义视角看，它可能被认为具有道德正当性。然而，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它可能导致隐私侵犯和个人自主性的丧失，而这些后果可能超过其潜在益处。另一方面，康德的义务伦理学很可能会认为，使用定向广告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没有把个人当作目的本身来对待，而是把他们仅仅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根据康德，个人拥有隐私权，应当被视为能够自行作出决定的道德主体。因此，任何把个人仅仅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的行为，例如利用其个人数据通过定向广告操纵其行为，都会被视为道德上不可接受。

考虑第4节所述的第二种情景，主要区别可以立即概括如下：如果目标是保护人们免受任何性质的攻击，那么按照功利主义框架，任何行动都是正当的，因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而且监控并不会直接影响（即伤害）人们。它更像是一种无形的控制，为了多数人的福祉而必不可少，因此必须接受。然而，康德视角下这一观点便不再成立。正如第5.2节所述，若将这种行为视为可接受的普遍原则，就会导致矛盾。要使这一框架有效，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和办法仍在于消除人们缺乏认知的问题。设定一个阈值或度量指标，以判定一个人是否值得受到控制，这种做法是武断、值得质疑且容易出错的。它会导致错误和主观性，因此虽有帮助，却无法解决该框架中提出的矛盾。相反，向人们提供信息能够消除操纵和缺乏自主性的问题；因此，如果监控资本主义并非旨在影响偏好、妨碍自主性，而只是为了整体福祉，那么控制行为在道德上就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监控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影响时，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相关国家的制度。极权政权将这些工具视为强化对民众控制的手段，而从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任何视角来看，这在道德上都不可接受；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则认为，在合理且高效地运用（并尊重人民的前提下），诉诸监控具有一定价值。事实上，边沁的功利主义或许会支持运用军事技术和政治手段收集数据、监控人们的行为，只要这能净增幸福或效用。例如，如果政府使用监视技术能够预防犯罪并保障公民安全，那么从功利主义视角来看，这种做法或许在道德上是正当的。然而，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它可能导致隐私侵犯和个人自主性的丧失，而这些代价可能超过潜在收益。另一方面，康德的义务伦理学很可能会认为，使用监视技术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侵犯了人们的自主性，未能将他们视为自身即为目的的人。按照康德的观点，个人享有隐私权，应被视为能够自主作出决定的道德主体。因此，任何将个人仅仅视为达成目的之手段的行为，例如未经同意收集数据，都是道德上不允许的。

6 结论

这项分析得出了重要结论。在两种框架中，我们都看到，意识这一方面至关重要，尽管根据具体的伦理框架，它所面对的问题有所不同。结合第一个情境，我们还得出了另一项重要结论：一种表面上危害较小且“无害”的行为，例如定向广告，也可能被视为十分恼人，其严重性并不亚于更明显的控制形式。在功利主义框架中，它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令人愉悦的侵扰；而在康德主义框架中，它可能颇具争议。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需要对其加以管控和规范，避免滥用。

如今，研究朝着使数据匿名化的方向发展非常重要，这样商业分析师便能从中获利，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关注隐私、自主性和监控等议题，并且未来可以在充分尊重人的前提下，从不断增长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商业利益和福祉。最重要的是，让信息技术能够保护权利。考虑到第二种情景，最后提出的一点是社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对操纵倾向的关注；这种操纵可能源于掌握信息技术等重要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教育能够防止对这种控制手段的不当使用，并使康德框架陷入矛盾，同时始终认识到不当行为随时可能发生，而目标在于将不公平降至最低。

尽管隐私、自主性和监控问题由来已久，但近年来，由于公司和政府收集并分析的个人数据数量不断增加，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随着技术持续发展，滥用这些数据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提高数据收集和使用过程中的透明度与问责性。这可以通过数据匿名化等措施实现，使分析人员能够使用汇总数据开展工作，同时不损害个人用户的隐私。此外，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等法规，旨在赋予个人对其个人数据更大的控制权，并要求公司更加透明地说明其数据处理实践。另一个重要考量是教育在促进负责任的数据使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不仅包括向公众普及其权利以及保护隐私的方法，还包括为数据科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培训，因为他们需要了解自身工作所涉及的伦理影响。通过倡导负责任的数据使用文化，并为公司和政府优先考虑个人权利创造激励机制，我们可以共同迈向这样一个未来：技术被用于造福整个社会，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少数有权势的参与者。

总之，本文提出的问题凸显了在数据使用与控制背景下出现的复杂伦理考量。虽然这些挑战并无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显而易见，我们需要优先保障个人权利，并致力于提升透明度、问责制和教育水平，以尽可能减少滥用的可能性，推动社会更加公正平等。监控资本主义的实践引发了重要的伦理问题，在技术迅速发展、社会规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必须对此进行审慎考量。通过从多种伦理框架和现实案例出发审视这一现象，研究者和实践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其中涉及的复杂权衡。

致谢

我想感谢维奥拉·斯基亚福纳蒂教授对本研究的支持，感谢她提出启发性的思考，并提高了人们对许多与信息技术行业相关的伦理问题的认识。

计算机伦理学也让我们能够考量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多元观点与价值观，包括用户、社区以及整个社会。这有助于确保我们的研究与实践符合更广泛的伦理和社会考量，并有助于推动积极的社会与环境成果。此外，它还促进科技领域形成一种恪守伦理责任、秉持专业精神的文化。通过强调伦理决策与问责的重要性，我们能够帮助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让技术服务于共同利益。

我认为，这种意识对于我们成长为更优秀的工程师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JB Foster、RW McChesnet。《Monthly Review》，2014。监控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军事—工业复合体与数字时代 [2] JE Cohen。《剑桥监控法手册》，David 编。2017。监控与隐私：影响及其意义 [. .] https://papers ssrn com SM West。《商业与社会》，2019。数据资本主义：重新定义监控与隐私的逻辑 [. .] https://journals sagepub com O Barbu。《Procedia—社会与行为科学》，2014。Elsevier。广告、微定向与社交媒体 [5] CE Tucker。2013。社交网络、个性化广告与隐私控制 [6] RG Pensa、G Di Blasi。《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17。Elsevier。在线社交网络隐私自我评估框架 [7] J Raudeli ̄unien ̇e、V Davidavi ̃cien ̇e、M Tvaronavi ̃cien ̇e。《Sustainability》，2018。社交媒体网络广告活动评估 [.] https://mdpi com D Muench、B Hilsenbeck、H Kieritz。《反恐、犯罪打击与国防领域的光学与光子学 XII》。2016。利用基于知识的视频监控检测基础设施操纵 [.] https://spiedigitallibrary org J Burkell、PM Regan。《互联网政策评论》，2019。选民偏好、选民操纵与选民分析：减少监控、增强自主性的政策选项 [.] https://econstor eu WJ Jie。《监控与安全之间：防范网络虚假信息与操纵法案（POFMA）》 [. . .] https://scholarbank nus edu sg C Ess、C Kwok、NK Chan、M Bay。《互联网研究协会（AoIR）精选论文》，2020。关于（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与算法的法律和伦理视角 [. .] https://journals uic edu K Plangger、M Montecchi。《互动营销期刊》，2020。Elsevier。超越隐私权衡：探究对客户监控的反应 [13] M Andrejevic。《监控与社会》，2019。监控自动化 [. . .] https://ojs library queensu ca Shoshana Zuboff。《大他者：监控资本主义与信息文明的前景》。《信息技术期刊》[15] JM Jacobs、QB Fox。2019。监控资本主义及其（非）预期后果 [. . . .] https://ses library usyd edu au N Couldry。《信息技术与政治期刊》，2017。Taylor & Francis。监控民主 [17] S Sevignani。《历史社会研究》，2017。JSTOR。信息资本主义中的监控、分类与社会不平等：信息市场背景下剥削问题的重要性 [18] Yama、Hiroshi。（2020）。《道德与当代文明》。10.4018/978-1-7998-1811-3.ch004。[19] Shoshana Zuboff。《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在权力新边疆为人类未来而战》。VPRO 纪录片。2019[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XhnWUmMvw]